

NEWS

2021年度

中国

HIV议题报道

媒体传播监测报告



2021 年度
中国 HIV 议题报道
媒体传播监测报告

2021 年度中国 HIV 议题报道媒体传播监测报告

出品：酷爱健康，爱滋徒步

统筹：Weilei Fan, Yufan Chen

主笔：Yufan Chen

研究者：Yufan Chen, Hao Gu, Zhuoyuan Wang,

Xinyi, Cecilia Peng, Aaron Rao

设计：Yufan Chen

致 谢

感谢刘小楠、苗伟山、桂天晗等学者、专家对本报告提出的学术指导与建议。感谢北同文化的李代明、《南方都市报》的吴斌从社群和媒体视角提供的专业建议。感谢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杨震先生对本报告提供建议与支持。感谢「中国彩虹媒体奖」的杨一对本报告提供技术指导。

2022 年 10 月

目录

一、概述	1
二、研究方法	2
三、监测结果	5
四、分析与阐释	9
五、总结与建议	20

一、概述

针对 HIV（即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与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防治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自人类发现 HIV 以来，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其已经从不可控制的“绝症”逐渐转变为可防、可控、不影响正常寿命的慢性病。然而，医学上的进步并未充分破除公众对 HIV 的迷思，与之相伴的恐惧、偏见、污名、歧视依然广泛存在，并进一步影响到 HIV 感染者及相关群体的生存权益，更成为 HIV 防治的阻碍。

媒体报道对于公众认知的塑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能反映公众对特定议题的认知状况。基于此，为更好地了解 HIV 议题在中国专业媒体报道中呈现的样貌，并分析既有报道对于 HIV 防治与反对基于 HIV 的歧视的实际效果，我们撰写了《2021 年度中国 HIV 议题报道媒体传播监测报告》，意图通过多维度的综合梳理，总结中国新闻媒体在 HIV 议题报道上的现状、特点与问题，并给出分析和建议，以更好地支持媒体及相关从业者在 HIV 议题上提供更专业的报道，促进公众对 HIV 议题的科学认知和友善态度，推动创造更多元、包容、平等的社会氛围。

本报告的研究样本为中国专业新闻媒体在 2021 年度发表的以 HIV/艾滋病为主要话题的中文新闻报道（含人物访谈、非虚构写作等），涵盖从中央到地方到行业的上百家主要新闻媒体。在未来，我们将继续开展年度中国 HIV 议题报道媒体传播监测，通过年度数据对比来更好地总结相关议题的趋势变化，更全面地展示媒体对 HIV 议题的认知动态。

通过对 2021 年度中国 HIV 议题报道媒体传播的监测，报告有以下主要发现：

1. 本年度 HIV 议题报道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后出现爆发式增长，此时段外的报道数量明显较少，HIV 议题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仍较为边缘；

2. HIV 议题报道主要围绕病毒防控工作展开，议题呈现的主体视角有限，反映 HIV 感染者困境、呼吁平等/反歧视的报道较为少见；

3. “恐艾式”防艾宣传影响了媒体的报道框架和叙事范式，陈旧的 HIV 知识体系影响了媒体报道准确度，进而难以发挥引导公众形成正确认知的积极作用。

二、研究方法

本报告将量化研究与质性分析相结合，对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境内媒体采编的 HIV 议题报道进行内容文本分析，总结 2021 年度国内 HIV 议题媒体报道的基本情况，并基于此展开相关讨论。

（一）监测范围

本报告所监测的对象为中国大陆境内具有合法采编资质的媒体，包含平面媒体（报刊、杂志等）、视听媒体（广播、电视等）、网络媒体等；监测内容为前述媒体在 2021 年度内采编并发布的以 HIV 为主要议题的中文文字报道，此类报道需满足以下条件方可纳入监测范围：

1. 以 HIV 为主要报道内容，若报道在用词上涉及“HIV”或“艾滋”，但本身不以 HIV 相关议题为主要报道内容的则不纳入；
2. 应为有采编资质的媒体机构的文字报道，即内容需要体现记者的采编劳动，专家约稿、读者投稿等内容则不纳入，同时也不包含非纪实的虚构内容，但包括媒体单位的非虚构写作，以及人物传记或访谈；
3. 内容篇幅至少在 300 字以上。

（二）检索方法

本报告分别以“艾滋”“HIV”为关键词，在梅子搜报网、中国搜索，以及相关媒体的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进行人工检索，并依据前述条件筛选后，收录符合要求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

（三）分析维度

本报告通过对检索所得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分析维度包括关注对象、报道地域、报道范畴、报道倾向和报道准确性，对这些维度进行单独分类的同时，也进行多种维度的交叉分析。具体分类标准如下：

1. 关注对象：即媒体报道中最主要关注或特别强调的特定人群，根据被关注对象的性别、年龄等身份特征进行划分，具体包括青少年/学生（含未成年人）；

男性同性性行为者；女性群体；老年群体；涉毒/戒毒人员；外来务工人员；艾防工作者/小组等。部分报道会同时关注多个特定对象。

2. 报道地域：根据被报道事件发生的地域范围划分，具体包括域内（中国大陆）；域外（港澳台及海外）。

3. 报道范畴：根据被报道内容本身的议题类别划分，具体包括：

（1）法律政策类：反映与 HIV 相关的立法、执法、司法及相关政策（含医保政策等）制定、颁布等活动；

（2）社会民生类：反映与 HIV 相关的与人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社会议题；

（3）医疗科研类：反映与 HIV 相关的医药、治疗、研究等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与最新成果等；

（4）病毒防控类：反映 HIV 防控措施的制定、发布和实施等相关活动，包括防艾宣传与知识科普，防控政策的制定、实施与最新进展通报等；

（5）权益倡导类：反映 HIV 感染者及相关群体在就业、就医、入学等情景中遭遇的歧视与困境，倡导反对基于 HIV 的歧视或为其提供平等权益保障等；

（6）经济消费类：反映与 HIV 相关的经济消费活动，如 HIV 相关医药技术的居民消费与经济效益，相关行业产业的经济发展状况等；

（7）文化娱乐类：反映与 HIV 相关的文化娱乐事件，如相关影视文艺作品、艺术创作与演出等；

（8）违法犯罪类：反映与 HIV 相关的涉及违法、犯罪的事件。

4. 报道倾向：即报道是否展现了媒体对 HIV 议题的友善立场，具体包括（1）积极，即积极发掘 HIV 感染者等群体遭遇的困境与歧视，为其倡导平等权益等；

（2）消极，即对 HIV 感染者等群体进行道德批判或人格上的贬低、歧视，过分渲染恐慌情绪等；（3）中立。

5. 报道准确性：即报道使用的 HIV 相关概念、数据或事实是否符合科学认

知，相关描述是否准确、全面，具体包括：（1）较好；（2）有瑕疵，即内容存在部分不影响实质内容的用词不严谨，如 HIV 和艾滋的混用；（3）较差，即内容存在明显的知识性、科学性或事实性错误。

（四）方法局限

1. 受检索方法以及部分媒体平台的检索限制（如设置“付费墙”、不提供检索功能、下架部分文章等），本报告未能穷尽 2021 年度内所有国内新闻媒体刊发的符合要求的 HIV 议题相关报道。

2. 本报告目前仅收录 2021 年度相关新闻报道数据，缺少与其他年度的比较分析。

三、监测结果

以下将通过报道数量与每月分布情况、报道地域、关注对象、报道范畴、报道倾向、报道准确性等维度进行监测结果的总体梳理与呈现。

（一）报道数量与每月分布情况

本报告共收录符合要求的 HIV 议题相关媒体报道共 592 篇。从时间维度来看,相关报道集中出现在该年十一月与十二月,报道数量分别为 104 篇(17.57%)和 365 篇(61.66%),其余各月报道数量分布较为均衡,最少为一月(5 篇),最多为九月(21 篇),除十一月与十二月外,平均每月有相关报道 12.3 篇。



图 1 2021 年度中国 HIV 议题报道每月分布

（二）报道地域

从报道地域来看,本年度共有 564 篇报道关注了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相关事件,占总体报道量的 95.27%;有 28 篇报道关注了发生于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和国家的的事件,占总体报道量的 4.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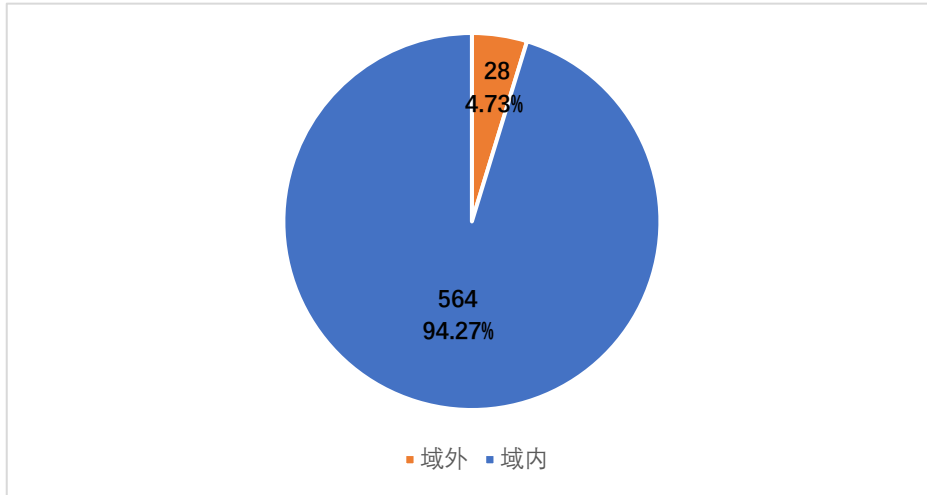


图 2 2021 年度中国 HIV 议题报道地域分布

(三) 关注对象

在本年度中，共有 258 篇报道明确聚焦了特定的关注对象。从各报道关注的对象来看，青少年/学生（含未成年人）获得了 143 篇报道的关注，占比最高（55.43%）；艾防工作者/小组、男性同性性行为者、女性群体紧随其后，分别获得 47 篇（18.22%）、36 篇（13.95%）、35 篇（13.57%）报道的关注。作为近年来艾防工作主要关注对象的涉毒/戒毒人员、老年群体、外来务工人员分别有 24 篇（9.30%）、21 篇（8.14%）、15 篇（5.81%）报道关注。而性工作者与多元性别社群（不含男同性恋者）受关注度最低，分别仅有 4 篇（1.55%）相关报道。

值得注意的是，本报告区分了关注对象中的男性同性性行为者与男同性恋者，并将明确提及男同性恋者的相关报道单独分类，共有 14 篇（5.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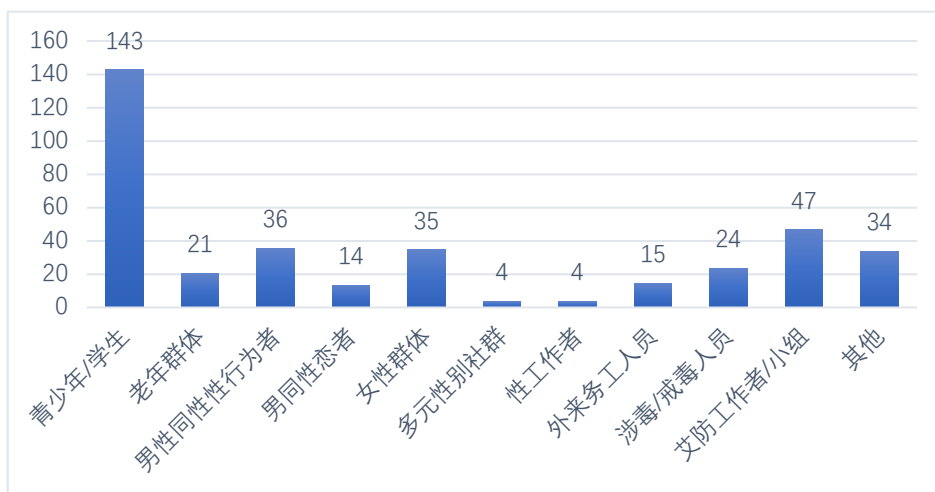


图 3 2021 年度中国 HIV 议题报道关注对象分布

（四）报道范畴

报道范畴重点描述相关报道的主题，为了更全面地呈现相关报道所涉范畴，本报告允许每篇报道最多划入两个报道范畴中。从结果来看，病毒防控类报道是本年度 HIV 议题报道的主要类型，共有 499 篇（84.29%）。其他范畴中，医疗科技类与权益倡导类较为突出，分别有相关报道 48 篇（8.11%）、43 篇（7.26%）。违法犯罪类报告最少，为 9 篇（1.52%）。

结合报道地域来看，涉及域外的报道中关注最多的范畴为医疗科技类，共 18 篇，在同类报道中占比 37.5%，相关报道大多聚焦域外有关 HIV 的最新科研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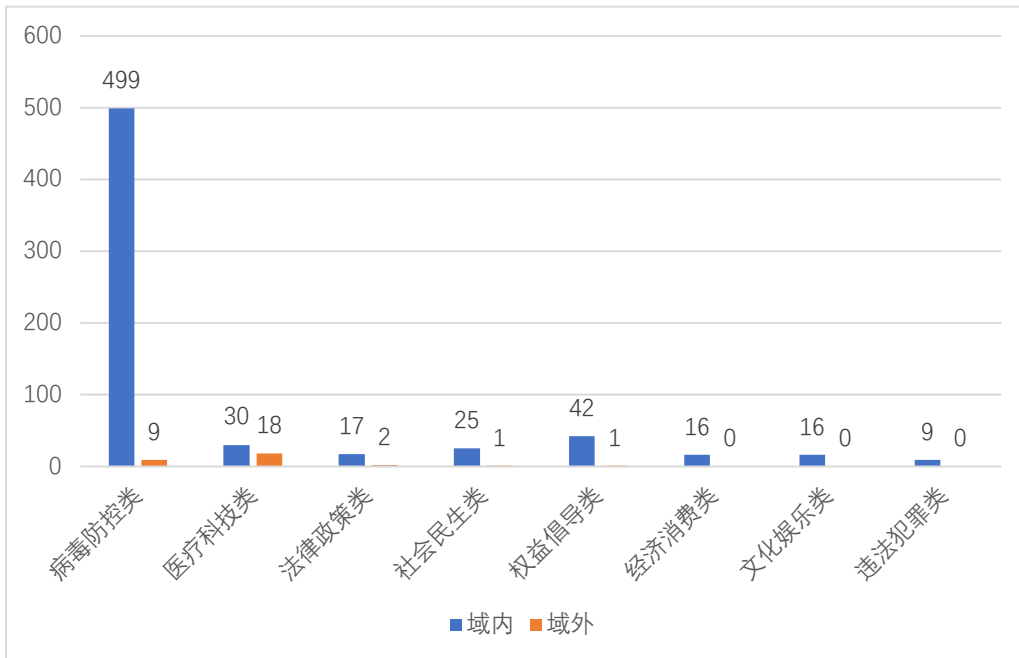


图 4 2021 年度中国 HIV 议题报道范畴分布

（五）报道倾向

报道倾向重点考察媒体在进行相关报道时是否具有一定的倾向性。根据统计结果，有 509 篇（85.98%）报道没有明确倾向性，以较为中立、客观的立场呈现了客观事实；有 59 篇（9.97%）报道采取了较为积极的立场，试图反映 HIV 议题内在的困境与歧视，或以友善的立场倡导尊重、平权与反歧视；而有 24 篇（4.05%）报道采取了较为消极的立场，其中普遍存在对 HIV 和艾滋病及相关群体的污名，或过分渲染恐慌、悲观等消极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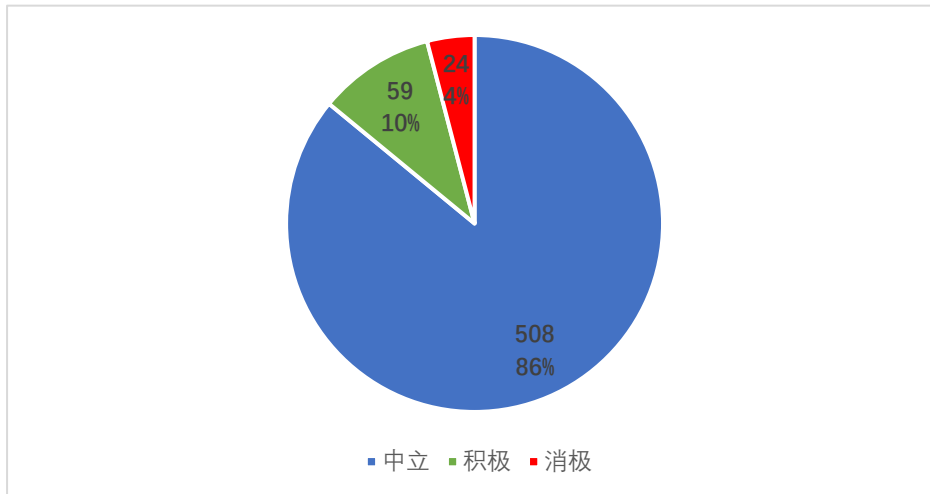


图 5 2021 年度中国 HIV 议题报道倾向分布

(六) 报道准确性

报道准确性重点考察相关报道是否准确地向公众传递了有关 HIV 的科学知识和客观事实。结果显示，近三分之一的报道在准确性上存在一定问题，其中 141 篇（23.82%）报道在准确性上有瑕疵，大多表现为对 HIV 和艾滋病概念的混用，相关用语不够规范等，整体上对于公众准确理解 HIV 相关信息的影响较小；而另有 43 篇（8.13%）报道的准确性较差，或是存在明显的知识性、科学性错误，或是未能全面、准确地呈现客观事实，足以较大程度地影响公众对 HIV 相关信息的正确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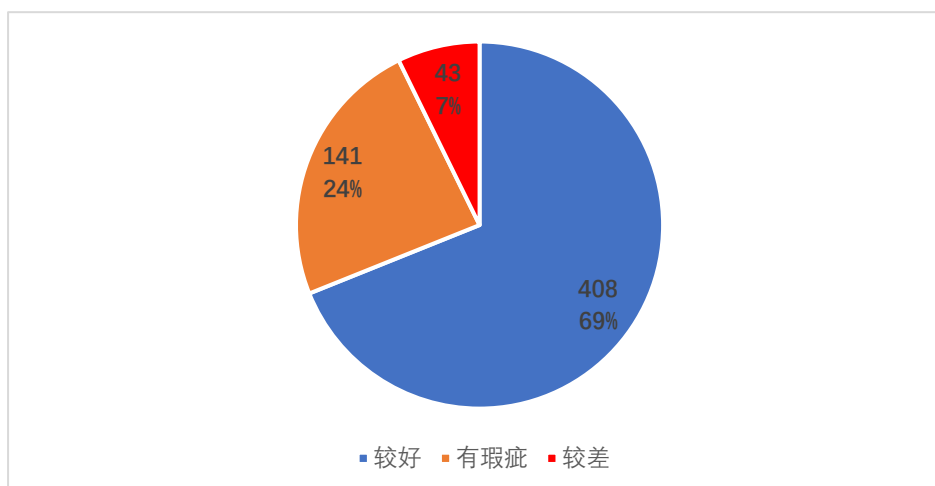


图 6 2021 年度中国 HIV 议题报道准确性分布

四、分析与阐释

本部分将在前述监测结果的基础上，针对其中反映出的现状、特征、问题等展开具体分析与阐释。

（一）报道时间过于集中，缺乏对 HIV 议题的日常跟进

在 2021 年度，HIV 议题报道的高峰出现在 11 月（104 篇）和 12 月（365 篇），而在其他十个月中，报道数量最多的 9 月（21 篇）与前者也有悬殊的差距。这是因为每年的 12 月 1 日为世界艾滋病日，作为一个与 HIV 密切相关的节点，各级政府的相关部门、各大高校，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均会在此期间密集举行各类防控、宣传活动，各地卫健委也会在当日前后介绍本地 HIV 防控的年度情况。据统计，发布于当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间的相关报道共有 365 篇，占全年报道量的 61.66%，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媒体对世界艾滋病日节点的准确把握，对相关活动的充分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媒体在 HIV 议题报道上缺乏日常跟进，在发掘其他相关新闻节点上还有待进步，如每年 3 月 1 日的世界艾滋病零歧视日、每年 5 月第三个星期日的国际艾滋病烛光纪念日等均未得到我国媒体的充分重视，在 2021 年度也未见相关报道。

（二）报道对象紧跟 HIV 防控趋势，呈现视角较为有限

在我国，HIV 防控会对 8 类人群进行重点监测，具体包括男性同性性行为者，毒品使用者、性工作者、性病门诊就诊者、长途卡车司机、孕产妇、青年学生和流动人口，而随着近年来我国受 HIV 感染群体呈现出新态势，老年群体也越发得到关注。据此，我国 HIV 议题报道大多也围绕上述群体展开。

在本年度，除青少年/学生群体以外，其他各类群体所受关注明显较少，使得多元主体视角在 HIV 议题报道中较为缺乏。以下将对部分人群的报道展开具体分析：

1. 青少年/学生群体：媒体主要关注对象，反映对青少年艾防工作的重视

根据 2021 年度监测结果，最受媒体关注的报道对象为青少年/学生，占比 55.43%，这是由于近年来青少年/学生群体受 HIV 感染的情况较为突出，大量媒

体就此进行了报道；同时，有关部门也针对青少年/学生群体开展了大量诸如“防艾知识进校园”等宣传活动，也受到了媒体的集中报道。这在侧面反映了我国近年来对青少年/学生群体中的艾防工作额外重视，而媒体的大量报道也进一步提升了公众对青少年性健康的关注，包括青少年性教育在内的议题也逐渐显现——在相关报道中，至少有 10 篇明确提及针对青少年及学生群体开展性教育的重要性。

2. 艾防工作者/小组：以医护人员为主体，民间社群组织受关注度低

在其他报道对象中，艾防工作者/小组受关注程度较高，其中大多数报道以医护人员为主要对象，以褒奖其为艾防工作做出的贡献为主旨，并透过对相关人物的刻画与采访，侧面展现 HIV 防治工作现状与 HIV 感染者的生存与权益状况。相比之下，从事艾防工作的民间社群组织所受媒体关注度较低，仅有 8 篇报道中有明确提及，其中一篇报道明确“各个国家 30% 以上的艾滋病相关的服务由社区组织来主导”“社区组织已经站在艾滋病防治的舞台中心”，¹更加说明民间社群组织在防艾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应当得到充分关注。

3. 女性群体：在报道中被“他者化”，缺少对女性独立主体的展现

在本年度，针对女性群体的报道共有 35 篇，其基本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是强调对 HIV 母婴间传播的防控，或是展示相关个案以凸显其重要性；二是描述女性经其丈夫而感染 HIV，刻画其“受害者”形象。无论是作为孩子的母亲，还是作为丈夫的妻子，女性在 HIV 议题报道中都主要以“他者”的身份出现，例如：

61 岁女性,自述: 退休后我一直在家帮忙带孙子,感染前对艾滋病几乎一无所知。一天晚上,老公说他得了一种传染病,医生让他通知老婆也要去检查。第二天我们夫妻俩一起去疾控中心,结果很快出来了:初筛阳性,需送到上级疾控做确诊。听到这个结果后我内心立马崩溃。医生的那句“你老公感染了 HIV(艾滋病病毒),你也可能感染”总是盘旋在耳边。我想想自己生活简单,除了感冒几乎不生病,传染来源除了老公外根本没有其他可能,于是整宿整宿的失眠,痛苦和无人倾诉。²

尽管当前男性是 HIV 感染者的主体，但在传统的性别权力结构下，女性 HIV

¹ 庞聪：《郭巍：社会组织在艾滋病防治的各环节都起到重要作用》，光明网，2021 年 9 月 14 日。

² 冯昕：《远离艾滋病 共筑夕阳情》，《萧山日报》，2021 年 6 月 25 日。

感染者的特殊困境与诉求也应当被充分关注，以女性为独立主体的 HIV 议题报道需要被更多地展现。

4. 男性同性性行为者与男同性恋者：基于性倾向与性行为的偏见广泛存在，缺乏对 HIV 感染与歧视困境的追问

男性同性性行为者与男同性恋者往往是 HIV 议题的重点关注对象，这离不开 HIV 防治历史中对这一群体的污名，同时也与近年来 HIV 的传播趋势密切相关。在本年度报道中，分别有 36 篇与 14 篇报道明确涉及男性同性性行为者与男同性恋者，其中，不少文章在用词上不够严谨规范，将性行为与性倾向划上等号，加剧了社会对男同性恋群体在 HIV 议题中的偏见，例如，有报道在新闻标题中直言“男同性恋群体风险最高”，并称“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中，异性恋和同性恋传播的比例分别从 2009 年的 48.3%和 9.1%增加到 2020 年的 74.2%和 23.3%”。³该报道将性行为等同于性倾向，以至于向公众传达了不准确的数据信息。需要强调的是，HIV 的传播与具体的性倾向、性活动对象、性活动频率等并无直接关联，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降低 HIV 感染风险的关键措施。

此外，由于同性恋者在我国媒体报道中可见度较低，社会上有关其的迷思尚未突破，因而在其与 HIV 的交叉议题中，更容易出现“猎奇”式报道，进而影响公众对同性恋者的认知，例如：

直到高中毕业，俞阳偶然加入一个社交群，在群内几位哥哥的“科普”下，才真正明白，自己就是大家口中的“男同”。

从那之后，俞阳在“哥哥们”的介绍下，进入到男同圈，通过社交软件交到了很多好朋友，也结识了一些不该认识的朋友。那些羞于吐露的暗恋，那些惊慌失措的掩饰，在这里似乎都能丢掉。大家吃饭、聊天、畅想未来，在内心的躁动下，也有了一次次的放纵。可俞阳眼中的这一切美好，都终结在他 21 岁那年的 4 月。⁴

本报道的主人公是一名男同性恋者，在描述其自我认同与社交时，报道称主人公“入圈”是被“介绍”，是一种“偶然”，并结识了“不该认识的朋友”，以至于其“一次次的放纵”，最终导致其感染 HIV。这种描述较为典型地迎合了

³ 张倩楠：《中国艾滋病感染者超 105 万，男同性恋群体风险最高》，界面新闻，2021 年 12 月 1 日。

⁴ 李丽涛，孙志文：《艾滋感染者的独白：我是一名男同性恋者，21 岁那年我感染了艾滋病》，《青岛晚报》，2021 年 12 月 1 日。

公众对于同性恋者的刻板想象，即青年学生开展同性社交都是基于“好奇”或“偶然”，青年学生总是容易被“引导”或“诱惑”，同性恋者都是性活跃者且更容易滥交等等。与此同时，这类报道往往忽视了同性恋者自我认同过程中的矛盾和迷茫，对其基于性倾向而遭遇的社会结构性歧视与易受 HIV 感染的原因也没有深度思考和追问，进而使得同性恋者与 HIV 直接绑定，强化公众对同性恋者与 HIV 感染者的误解和偏见。

5. 老年群体：可见性仍有待提高，需正视老年群体的性需求

近年来，我国老年群体感染 HIV 的趋势不断增加，并逐渐引起重视，但在 2021 年的相关报道中，仅有 21 篇明确以老年群体为报道对象，老年群体在 HIV 议题中的可见性仍有待提高。此外，部分报道对于老年群体感染 HIV 的根源缺少反思，没有正视老年群体的性需求，未能向公众传达正确、友善的防艾理念，例如：

退休职工 A 早年丧偶，独自一人住在郊区。子女已成家立业，很少相聚。A 居住地附近有一些外地人专门提供特殊服务。经不住诱惑，A 光顾过几次。一次 A 突发脑溢血住院，查出得了艾滋病。A 千叮咛万嘱咐，拜托医生不要告诉儿女，太丢人了。

提醒：“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作为子女应该多关心长辈。作为长辈，应该为子女树立榜样，洁身自好，远离艾滋。⁵

本报道将 A 感染 HIV 的原因归结为缺少子女的关注，同时强调其“经不住诱惑”，事后觉得“太丢人”，评价其没有“为子女树立榜样，洁身自好”。这种视角反映了媒体对老年群体的性需求缺乏正视和反思，更是将传统的亲情观与性需求混为一谈，不利于公众正确理解老年群体的 HIV 困境。

6. 涉毒/戒毒人员：多以负面形象展现，以禁毒防艾工作成效为突出重点

在 HIV 议题报道中，涉毒/戒毒人员存在明显的身份交叉：一方面，其往往作为毒品使用者或涉嫌毒品犯罪而被贴上“吸毒者”“罪犯”等负面身份标签；另一方面，感染 HIV 的经历又加剧了其身份污名。在此情况下，多数报道着重刻画涉毒/戒毒人员的负面形象，形容其状态如“陷入泥潭/深渊”“毁掉的人生没

⁵ 戴伟文，唐慧玲：《这个病今年金华新确诊超 500 例，警惕！这个群体增幅最多……》，金华新闻网，2021 年 12 月 1 日。

有希望”；⁶或称其使用毒品后的生活充满“萦绕的毒烟、无数个难以入眠的夜晚，还有致命的‘艾滋病’”；⁷“计量人生的方式从‘我今年多少岁’变成了‘我还有多少年’”。⁸

在报道中，当事人接触毒品或被感染 HIV 的经历大多被一笔带过，而更多强调的是戒毒所或监狱对其的教育和帮扶工作，当事人的个人经历成为禁毒防艾工作成效的“注脚”，例如：

看着照片上从废墟中拔地而起的新房，阿能掉下了感激的泪水，过去两年间的点滴在她心头重现。曾经，毒品的危害、艾滋病的防治对于阿能来说是一片盲区，进入戒毒所之后，她终于接触到系统的健康教育，并逐步建立起知法守法的法治意识。曾经，面对生活的挫折和打击，阿能的第一反应是逃避，切断自己与现实的联系，现在，她直面人生的“废墟”，以积极的态度，不断为实现自己与家人的重逢而努力。“感谢党，感谢政府，我一定会积极进行抗病毒治疗，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命，和孩子们一起好好生活。”阿能发自肺腑地说道。⁹

在此类报道中，涉毒/戒毒人员因交叉身份带来的困境没有被充分呈现，报道重心往往在其接受改造的过程而很少跟进其回归社会生活的情况和可能面临的困难，难以改变公众对涉毒/戒毒人员和 HIV 感染者的偏见与歧视。

（三）报道范畴集中于病毒防控，权益倡导类数量少但视角丰富

1. 以病毒防控宣传稿为主，PrEP/PEP 相关报道较受重视，新冠交叉议题报道有限

在 2021 年度，共有 499 篇报道以病毒防控为主题，占总量的 84.29%。这些报道大多围绕特定地区 HIV 传播最新动态、HIV 防控政策，以及 HIV 防控宣传活动和知识科普等展开，基本属于宣传稿，可供媒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有限，对于公众的告知与说教作用更为突出，较少以人文关怀视角反映 HIV 感染者的困境及背后的偏见与歧视。

由于病毒防控类报道大量挤占了媒体报道空间，相比之下，其他几类范畴的

⁶ 胡水清，蒋成铁：《陷毒品深渊又感染艾滋，他的未来何去何从……》，《上海法治报》，2021 年 7 月 9 日。

⁷ 石喻涵，胡茜，张军：《窗外有阳光还有希望 | 探访陕西唯一收治艾滋病人的强制隔离戒毒所》，《三秦都市报》，2021 年 12 月 1 日。

⁸ 王晗阳：《她，从毒品漩涡溯流而上》，《四川法治报》，2021 年 11 月 26 日。

⁹ 王晗阳：《她，从毒品漩涡溯流而上》，《四川法治报》，2021 年 11 月 26 日。

HIV 议题报道均不及总量的 10%，这反映出媒体对 HIV 议题的拓展广度、深度有限，更突出了以多种维度呈现 HIV 议题的必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 HIV 感染的暴露前预防（PrEP）与暴露后预防（PEP）科普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重视，有 21 篇报道明确以介绍 HIV 暴露前/后预防为主题，约有 40 篇报道在文中明确介绍了相关知识，对于公众了解 HIV 阻断机制和降低恐慌感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新冠疫情对 HIV 防控工作的影响是国际上普遍关注的议题。然而，本年度与新冠疫情关联较为密切的中国 HIV 议题报道仅有 4 篇，其中域外报道 3 篇，域内报道 1 篇；2 篇报道为与新冠病毒相关的医疗科技类报道，分别介绍了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与 HIV 可能的关联，¹⁰以及新冠疫苗的研发对 HIV 疫苗研发的启示；¹¹另外 2 篇报道为病毒防控类，其中一篇介绍了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期间，中国社会组织在 HIV 社区防治工作中的突出作用，¹²另一篇则报道了联合国大会主席呼吁全球团结以抗击 HIV 和新冠病毒。¹³总体上，国内媒体对于新冠疫情与 HIV 的关联性认知不足，有赖于国际社会相关研究及事件进展，不能充分反映新冠疫情与 HIV 防控交叉议题下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

2. 权益倡导类报道以深访为主，议题展现视角丰富

尽管空间有限，但权益倡导类议题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在除病毒防控类报道以外的范畴中数量最多，共 48 篇（8.11%）。与前者不同，权益倡导类报道大多是媒体在对 HIV 感染者面临的困境进行深度采访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普遍篇幅较长，视角更为深刻和丰富，例如：第一财经深入探究了近年来老年群体感染 HIV 的原因，强调要正视老年群体的性需求；描述在性工作者群体中防控 HIV 的难度；突出 HIV 带来的“病耻感”和“标签化”等问题，及由此带来的 HIV 感染者被拒诊的困境，强调歧视和惩罚会迫使感染者“转入地下，扩大新的

¹⁰ 纪光伟：《艾滋患者成新冠病毒“变异工厂”》，《武汉科技报》，2021 年 12 月 6 日。

¹¹ 张梦然：《利用新冠疫苗平台技术 实验性 mRNA 艾滋病疫苗前景看好》，《科技日报》，2021 年 12 月 10 日。

¹² 庞聪：《郭巍：社会组织在艾滋病防治的各环节都起到重要作用》，光明网，2021 年 9 月 14 日。

¹³ 王建刚：《联大主席：抗击艾滋病病毒和新冠病毒需全球更紧密团结》，新华网，2021 年 11 月 30 日。

感染，也会转移社会对遏制艾滋病传播有效措施的关注和资源投入”。¹⁴新京报深入报道了 HIV 感染者面临的就业歧视困境，包括更容易失业，且维权困难。¹⁵

《新民晚报》以 HIV 感染者 Ben 从事的社群工作为切入口，展现了感染者努力接纳自我与互帮互助的积极一面。¹⁶澎湃新闻以沈阳资深艾防公益人马铁成为视角，展现了跨性别、同性恋等社群中的 HIV 感染者在亲情、爱情等议题中的困境¹⁷……这类报道以丰富的视角和鲜活的事例展现了 HIV 感染者面临的实际问题，呼吁为其提供平等、包容的环境，对于破除公众对 HIV 感染者的偏见、污名、歧视起到了正面引导作用。

（四）报道倾向以中立为主，“无意识”的污名化值得警惕

在本年度中，有超过 85% 的报道（509 篇）采取了中立的报道倾向，这一方面是由于媒体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不断提高，另一方是因为多数报道属于事件通稿，一般不带有明确的媒体倾向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有 24 篇（4.05%）的报道采取了较为消极的倾向，其中普遍存在对 HIV 感染者“无意识”的污名化，即在用语上没有明显针对 HIV 感染者的歧视，但仍在道德上对其进行责难，或过分渲染与 HIV 相关的恐慌情绪，进而加剧公众对 HIV 及感染者的刻板偏见。例如，部分报道为了突出艾防工作的“特殊性”，会过分渲染 HIV 感染者的悲观情绪或 HIV 带来的恐惧氛围：

2015 年 5 月的一天下午，一个 HIV 确证阳性病人需要抽血，这对尹德清来说已是司空见惯。抽血时，病人因为紧张害怕，猛地一抽胳膊，带血的针头一下子扎到她的手上……阳性病人的血感染性有多强可想而知。妥善安置了病人后，尹德清马上去处理自己的伤口，并按程序服用抗病毒药。

那天，科里的人都回去得很晚，同事们都想安慰她，却找不出合适的话，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是多么危险。她不怪病人，只怪自己还不够小心，只是自己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未成年的孩子，如果真的感染上，以后拿什么去照顾老人、孩子？想到这些，她恳请同事们对此事保密。

因为抗病毒药的副作用，尹德清开始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这让原本就很瘦的她更加消瘦。

¹⁴ 彭海斌：《中国百万艾滋病患者的隐晦人生 | 海斌访谈》，第一财经，2021 年 8 月 5 日。

¹⁵ 马瑾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我不想“隐身工作”》，新京报，2021 年 11 月 30 日。

¹⁶ 李若楠，孔明哲：《HIV 感染者 Ben 的第八年：用生命影响生命“他们有需要，我就在”》，《新民晚报》，2021 年 12 月 1 日。

¹⁷ 伍惠源：《打开玻璃罩：不止于这个世界艾滋病日》，澎湃新闻，2021 年 12 月 1 日。

在那段日子里，尹德清没有请过一天假，艾滋病检测的工作一刻也没有停下来。最终，“幸运女神”还是眷顾了她。¹⁸

在本报道中，被报道的医护人员发生职业暴露，并按要求及时服用了抗病毒阻断药物，在此种情形下几乎不会造成 HIV 感染。然而，本报道却在其中过分强调“阳性病人的血感染性有多强可想而知”，同时以当事人“如果真的感染上，以后拿什么去照顾老人、孩子”等所谓心理活动来渲染恐惧氛围，并将当事人未感染 HIV 的结果归因于“幸运女神”的“眷顾”，没有向公众传达正确的 HIV 防治观念，更容易加剧公众对 HIV 的刻板偏见。

又如：

62 岁的李大爷，尽管从未娶妻，但却从不寂寞。“一定要有女人吗？”“也可以有男人嘛！”……

65 岁的王大爷已婚，尽管年近古稀，但思想却十分“前卫”。谈及对目前社会上的婚外性行为看法，王大爷的回答是：“支持，有存在的必要性。”而他的婚外性行为则达到了 5 次以上……¹⁹

报道试图以较为戏谑的方式呈现出当前老年群体的性观念，但文中仅对“李大爷”“王大爷”的个人观点进行展示，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同时其用语暗含了对受访者在性观念上的道德批判，而非对老年群体性需求的正面回应。

再如，部分报道会假设存在 HIV 感染者“报复社会”的情形，无意中将 HIV 感染者置于道德对立面，更无端加深公众对 HIV 的恐惧和偏见：

尽管避孕套可以降低艾滋病感染几率，但不绝对安全，年轻人切不要太放纵自己。众所周知，性传播是艾滋病传播途径中占比最高的，而某些人感染艾滋病后，因为绝望，以破罐破摔的心态报复社会，想尽办法恶意传染他人。²⁰

沈雁指出，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使感染艾滋病的概率降低 99% 以上，还可以有效预防其他性病。“虽然安全套可以降低艾滋病感染几率，但不排除可能会有艾滋病人恶意报复社会的情况，

¹⁸ 衣方杰：《做热爱的工作不惧风险——记沂蒙最美科技工作者尹德清》，《临沂日报》2021 年 8 月 2 日。

¹⁹ 冯启榕，冯启榕：《自觉防艾，避免人生悲剧发生》，《江海晚报》，2021 年 12 月 1 日。

²⁰ 余燕红：《防控艾滋病除了安全套，还有“后悔药”》，《羊城晚报》，2021 年 4 月 6 日。

所以也不是绝对安全，建议年轻人不要太放纵自己，做到洁身自好。²¹

这类报道中有关“艾滋病人恶意报复社会”的话语均没有提供明确的事实依据，更多源自报道者的假设，而这种所谓的“善意提醒”本质上是对 HIV 感染者的偏见，不利于公众正确理解和尊重 HIV 感染者。

（五）报道准确性较为堪忧，知识体系亟待更新

尽管在本年度准确性较好的 HIV 议题报道数量达 408 篇（68.92%），超过整体三分之二，但这些报道中的大部分为病毒防控相关的事件宣传稿，体量较小，涉及 HIV 相关的科学性、知识性、事实性内容少，因此更不容易产生明显的差错。

而需要重视的是，本年度有近三分之一的 HIV 议题报道在准确性上存在问题。其中，141 篇（23.82%）报道在准确性上有明显的瑕疵，集中体现为对 HIV 和艾滋病的概念混用，如对于 HIV 感染者不问其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情况而统一称其为“艾滋病患者”“艾滋病病人”；或直接以艾滋病代替 HIV，进而出现“感染艾滋病”“传播艾滋病”等说法；或将 HIV 感染者称为“传播者”等。这类瑕疵的出现主要与医疗系统、新闻媒体以及普通公众多年来的语言使用习惯有关，同时也折射出专业科普未能深入到社会生活层面，本质上仍反映了社会对 HIV 和艾滋病的认知普遍存在偏差。尽管这类瑕疵不会在太大程度上影响公众理解报道内容，但其仍会在潜移默化中加深公众对 HIV 和艾滋病的误解，进而强化既有偏见。

此外，另有 43 篇（8.13%）报道的准确性较差，这些报道普遍存在较为明显的科学性、知识性、事实性错误（或偏差），足以影响公众对 HIV 议题的正确认知，需要充分予以警惕。例如，在防艾途径层面，至少有 30 篇相关报道明确将“洁身自好”“禁欲”“遵守性道德”等措施视作优先于“正确使用安全套”的预防 HIV 感染的“根本途径”，这种观念不仅不符合当前的科学认知，还将 HIV 议题与性道德绑定，更加剧了公众对 HIV 感染者的道德污名。同时，约 20 篇报道依然在使用陈旧的知识体系进行 HIV 科普，例如强调与他人共用牙刷、剃须刀会有感染 HIV 的风险，而不以科学研究结果来佐证；²²或强调唾液、眼泪中也有

²¹ 张婷婷：《蚌埠艾滋病控制在低流行水平》，蚌埠新闻网，2021 年 11 月 30 日。

²² 侠克：《艾滋病如何防控，听听疾控专家怎么说》，新华网，2021 年 12 月 2 日。

HIV，而不澄清其病毒载量少与传染性低的事实；²³或仍以过时的数据介绍 HIV 检测的窗口期（每个人的窗口期长短不一，一般是 2~3 个月，但也可以长达 12 个月）。²⁴此外，还有报道大量使用模糊的数据来源，得出的结论与事实也有偏差，例如：

国内 2014 年的报告发现，艾滋病的性传播比例可以达到 90% 以上，其中，异性性传播占 66%，同性性传播占 25%，男男同性恋成主要传播途径。

为什么男性在艾滋病的传播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呢？

首先是生物学原因，大量研究证实，男性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女性的可能性是女性传染给男性的两倍，因此，男性更容易使女性处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之中，而且男性更容易有多个性伴侣。

第二，男性比女性容易发生危险的性行为 and 吸毒等恶习，增加了男性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性。据统计，70% 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传染是异性间的性行为造成的，10% 是由男性之间的性行为所致，还有 5% 的传染发生在静脉吸毒者中间，其中 80% 是男性。²⁵

本报道称“男男同性恋成主要传播途径”，但根据其提供的数据并不能得出该结论，且报道直接将“男性同性性行为”以“同性性传播”替代，忽视了女性同性性行为的存在，同时，报道前后提供的数据信息并不一致，所谓“大量研究”也没有提供明确的研究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报道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此外，不少报道在进行 HIV 知识科普时没有全面呈现科学事实，进而影响到公众对 HIV 的准确认知。例如，一些报道会突出强调艾滋病“危害极大”“死亡率高”“没有疫苗”“不可治愈”等问题，或渲染 HIV 感染者需终身服药且副作用极大，强化公众对 HIV 的恐惧，但未强调相关死亡率的统计口径，未科普相应的预防与阻断措施，未说明感染者接受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后可实现功能性治愈、不影响健康状态和寿命等关键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报告的法定传染病中，艾滋病的死亡人数最多。艾滋病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恶性传染病。HIV 病毒侵入人体，能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令感染者逐渐丧失对各种疾病的抵抗能力，最后导致死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显示，艾滋病目前还没有疫苗可以预防，也没有治愈这种疾病的有效药物或方法，属于当前最棘手的医

²³ 闫妍：《世界艾滋病日：预防艾滋病 你不可不知的那些事儿》，人民网，2021 年 12 月 1 日。

²⁴ 陈晶：《惟有预防为重艾滋才能“清零”》，《人民政协报》，2021 年 12 月 1 日。

²⁵ 纪光伟：《艾滋患者成新冠病毒“变异工厂”》，《武汉科技报》，2021 年 12 月 6 日。

学难题之一。²⁶

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死亡率高的严重传染病，到目前为止，仍未发明有效的疫苗和治愈该疾病的方法。一旦感染，病人需要终身服药，不仅要忍受药物副作用给身体带来的不适，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掌握预防知识，拒绝危险行为，做好自身防护，才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²⁷

此外，近年来相关医疗专家和社群组织正在努力推进的“U=U”²⁸概念在我国相关媒体报道鲜有提及。在2021年度，仅有一篇报道明确认可了“U=U”：

发言人又提到，艾滋病是由艾滋病病毒所引致。及早接受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治疗，能预防艾滋病及由病毒引致的并发症，亦可大大改善患者的生活质素及延长生命。而感染者如接受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治疗并能持续抑制病毒，以达至无法检测的水平，就不会透过性接触传播艾滋病病毒。

29

当前，推广“U=U”对于降低社会对HIV的恐惧和偏见，提升HIV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意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U=U”在我国还未有相关政策明确推进，以至于媒体对这一概念普遍不了解，甚至有媒体在报道中无意地否认/质疑了“U=U”的真实性：《三联生活周刊》在《艾滋病何以入侵“象牙塔”》一文中描述了大学生张烨经其正在接受HIV抗病毒治疗的男友而感染了HIV，文末提及张烨经过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其免疫系统与常人无异，“且HIV病毒载量检测也低于最低限值，几乎不具任何传染性”，但是文章在结尾时却称：“而这，也是知道真相的那个夜晚，张烨前男友面对质问时所用的理由。”³⁰结尾这一描述，在无意中使得公众对“U=U”的信任程度大打折扣，究竟是张烨前男友在撒谎，还是有其他未能探明的原因，文章并未给出明确的回应，这也使得“U=U”的科学性在本报道中成了不可验证的“诛心之论”，更加深了公众的恐惧与偏见。

²⁶ 温潇潇：《1月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死亡1476人，其中艾滋病死亡1250人》，澎湃新闻，2021年2月24日。

²⁷ 林樱：《终结艾滋病流行，台州还有多远？》，《台州日报》，2021年11月27日。

²⁸ Undetectable = Untransmittable，即检测不到=没有传染性，指HIV感染者按规定接受抗病毒治疗后，血液中如果6个月以上测不到HIV病毒载量或病毒有效抑制，并且持续保持时，HIV感染者经性行为方式将HIV病毒传染给他人的风险是零。

²⁹ 《香港今年首季接获逾百宗艾滋病病毒感染个案》，中国新闻网，2021年5月25日。

³⁰ 黄子懿：《艾滋病何以入侵“象牙塔”》，《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2月1日。

五、总结与建议

整体来看，本年度 HIV 议题报道在报道时间、报道范畴、报道对象等层面均呈现出在特定时段、特定议题与特定对象中过于集中的情况，具体表现为世界艾滋病日前后的报道占据总量的 61.66%，病毒防控类报道占据总量的 84.29%，青少年/学生群体占据总量的 55.43%，这反映出当前媒体对 HIV 议题的认知过于局限，缺少多角度、多元化的报道视角，使得 HIV 议题难以真正进入日常生活。同时，相关报道仍是依附于病毒防控工作而存在，也未能充分发挥出媒体在传递人文关怀、反映歧视困境、呼吁平等权益、引导公众形成正确认知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此外，本年度媒体在 HIV 议题报道中存在的消极倾向及准确性较差等问题值得反思。当前，媒体在 HIV 议题报道中往往囿于传统的报道框架和思维模式，同时对 HIV 议题不够了解，缺少基于科学依据与客观事实的独立思考，进而导致其难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只能依从于陈旧的知识体系。从其中暴露的问题来看，媒体对 HIV 议题“无意识”的污名化与具有偏差性的报道，与我国常年来推行的“恐艾式”防艾教育有很大关联——即重点讲述 HIV 的危害与恐怖，意图让公众在恐惧氛围中强化对自身行为的道德约束，而忽视了对 HIV 感染者给予足够的人文关怀与平等保障。在这种教育模式下，HIV 感染者会被推向社会与道德的对立面，加深公众的恐慌与偏见的同时，使得感染者更容易在家庭、校园、职场、医疗、社会等层面陷入被歧视的境地，并强化 HIV 感染者自身的病耻感，不利于及时发现感染者并为其提供适当的治疗，更会给 HIV 防控工作带来巨大的阻碍。

当然，本年度的 HIV 报道在科普暴露前/后预防、多角度展现 HIV 议题等方面也出现了很多良好实践。综合本年度监测结果，本报告对中国 HIV 议题报道给出以下建议：

1. 突破以“病毒防控宣传为中心”的报道思维，积极拓展 HIV 议题报道范畴与主体视角，反映女性、老年、多元性别社群、涉毒/戒毒人员等群体在 HIV 议题中的特殊困境，突出民间社群组织在 HIV 防控中的重要作用；

2. 积极更新 HIV 相关知识与科普体系，主动与国际接轨，学习 HIV 相关领

域的科学研究，了解相关权益倡导的最新动态；

3. 脱离“恐艾式”防艾宣传框架，积极反思 HIV 议题背后的社会问题，主动反映感染者遭遇的歧视困境；

4. 不要“猎奇式”展现同性恋、性工作者等社会边缘群体，要传递必要的人文关怀；

5. 尽可能完整地呈现 HIV 防控知识，包括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必要性与益处，积极推广 HIV 暴露前/后预防措施，主动普及“U=U”等概念。

媒体对于公众认知能力的塑造有着深刻的影响，向公众传播正确的 HIV 防控知识与友善理念对于保障 HIV 感染者平等权益、控制 HIV 在社会层面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在今后能涌现出更多具有人文关怀的、消除污名与歧视的 HIV 议题报道，真正发挥媒体在 HIV 防控与权益倡导层面的独特作用。

NEWS



2021年度
中国HIV议题报道
媒体传播监测报告

